

mi yi yang
de yi ci an qing



吴基民 著

本书所叙述的人物都是真实的，我曾多次采访过他们本人，或者采访过他们的亲属。他们和我触膝长谈，为我回忆起这一段历史，讲述了这一个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谜一样的情



上海远东出版社

迷一样de 一段情

吴基民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谜一样的一段情/吴基民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ISBN 7-80613-889-7

I. 谜… II. 吴…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968 号

谜一样的一段情

吴基民 著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开本	850 × 1168 1/32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印张	10.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千字	255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7-80613-889-7/I·324

定价:18.00 元

序

已经是20年过去了,当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里,性格最活跃和上海同学,是吴基民兄和徐克仁兄(到现在仍然是他们两位最活跃)。当然他俩的活跃还不太一样,克仁兄暂且不说,吴基民兄是属于那种信息灵通而关心国家大事、勤于写作又喜标新立异的人。关于前一个特点,我记得在1978年暑假中的一日,大约是卢新华的《伤痕》刚在《文汇报》上发表不久,思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才拉开序幕的时候,基民兄约我们几个上海同学去聊天,在一个公园的亭子里大谈《伤痕》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经过,他介绍了许多内幕新闻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其实我一向不关心国家大事,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不过那时候的思想解放运动联系着每一个知识分子或将成为知识分子的人的命运,所以也不由得你不关心。以后,我凡遇基民兄高谈阔论的时候,总爱凑过去听点边角料,虽然于我无直接关联,但总能生出一点趣味来。关于后一个特点,大约也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以后,自《伤痕》起中文系的同学掀起了创作的高潮,《杜鹃啼归》、《女神在行动》、《春鸣》、《秦王李世民》等一浪高过一浪,那时还不流行政论性的文体,大家都在小说散文戏剧里做功夫,吴基民兄却写了一本十几万字的政论体作品,书名叫《历史是怎样写成的》,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产

生原因。虽然那时中央已经作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由于思想禁锢的惯性，还没有人直接去研究“文革”历史，基民兄也明知这样的书无法正式出版，但他仍然认真思考和写作，写出来后在同学老师当中流传过一阵子，成为中文系的一个热门话题。到了80年代后期，这一类作品成了畅销题材，本来我以为基民兄会把这本书稿修订后拿出去出版，或许也能表现其先见之明，但他似乎把它忘了，并未见到这部书稿的问世。后来一想也对，对一个人来说，思想的自由是最愉快的，自由自在地思想，自由自在地把所思写出来，并且与朋友们自由自在地讨论争辩，那时候的大学提供了这么一个气候宜人的好环境，至于后来能否在商业性的文化市场上图利获名，倒成为一个煞风景的话题了。

像吴基民兄这样个性特点的人本来是很适合当一名新闻记者，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毕业时他去了文史馆工作。我很难想像他这样生龙活虎的人到文史馆去能做什么，可是我又一次多虑了。文史馆本来是藏龙卧虎之地，大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中，猛虎离山、蛟龙潜渊的命运浮沉也是很普遍的现象。聚天地不平之气，视百年沧桑之云，各路可歌可泣的悲剧性人物都汇集于此地，基民兄以新闻记者的敏锐与中文系出身的修养，在其中如鱼得水，收集各种被历史所掩盖的破碎信息，于是，毕修勺、黄定慧、顾顺章、关露、李秋君……各种传奇式的人物命运都汇集到他的笔下，仿佛要借助于他的笔，显现出历史壮剧幕后的悲剧性角色的灵魂来。这本《谜一样的一段情》所收的各种传奇故事，大约都是根据他在文史馆时期积累下来的史料所写。以后基民兄还是走进传媒领域，人尽其才地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但我想文史馆的这段经历是他人生中很宝贵的时期，他创作了许多凄迷动人的传奇故事，塑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留给人们很长很长的沉重思考……

这本作品集所叙说的故事，大致分做两类，一类以男性为主

人公的故事，大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惊天动地的惨剧，如顾顺章叛变、如“四一二”事变等，都是大事件，过去中共党史里都是有记载的，但又语焉不详。吴基民兄对具体事实经过一一钩沉，于当事者口中的活材料，再证于史实，使许多细节再现于史，为以后的党史研究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如对向忠发的叛变，一向有不同说法，但在黄定慧的情报生涯里间接地提供了有力的旁证（请参阅《黄定慧：一个经历三次婚恋的奇女子》）。这些历史知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引起后人的深刻反思。向忠发、顾顺章这些人，多半是带着流氓无产阶级的社会习气卷入残酷的阶级斗争，本来在思想上品质上远不及第一代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但东方近代社会的特有文化所提供的政治舞台，却造就了一批流氓无产阶级的领袖，现代政治史里到处可见这号人物。流氓大都以无固定的精神追求为特征，在风云际会中他们也许会成为一时的滑稽英雄，可是他们本来就不知革命的最终目标为何物，本来就没有彻底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作准备，本来就缺乏用理性来判断事物的能力，一旦在命运经受考验的关键时候便露出了骨子里的贱相。我们过去研究党史总是批判知识分子的左倾右倾，却很少将这批流氓政治领袖作为对象加以研究，所以吴基民兄笔下的叛徒列传，不仅仅是历史学的课题，而对今天仍然有着切实的意义。书中还有几篇以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与不幸命运为题材的作品，如关于郁达夫、李叔同和毕修勺的故事，虽然也是小人物在历史巨涛下的悲情故事，但所歌颂的崇高人格与高贵灵魂与这批流氓政治领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书中另外一类故事，是以现代知识女性为主人公的传奇，所揭示的就如书名所示：谜一样的一段情。这“一段情”，是指女主人公生命历程中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所恋对象又往往是现代文化史上的精英龙种，必然以轰轰烈烈的生命宇宙大爆炸为其壮观；但这“谜一样”，又暗示其必定是在某种历史主流话

语的遮蔽下的爱情悲剧,爱得扑朔迷离,爱得云幔雨幛,爱得难言难诉。如关露、黄定慧与郭安娜,其爱情是在政治斗争等外力的冲击下破如碎片,或说当事人是无辜的,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但是,为了这样冠冕堂皇的宏大理由,其爱情——个人生命中永恒的幸福,个人一生的生存之意义与价值,就真的如此微不足道么?导致这样悲剧的历史本身就没有丝毫该令人反省的成分吗?吴基民兄处处着笔于政治人物对爱情的漠视,悲天悯人之心弥散于文字之间,读者不难体验历史的残忍,如果抽去这种悲天悯人之心,名人的爱情也不过是文化市场上的庸俗点缀而已。《郭沫若日本归来始末》写的是郭沫若亡命日本期间与日本妻子相依为命的故事,但于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他秘密回国参加抗日,这固然是出于民族大义,其别女抛妻的壮举也一再为国人称道。但是从郭安娜的立场来说,郭沫若决定回国参加抗战的一瞬间起,她的被抛弃的命运已经是无可挽回了。出于不忍之心,基民兄没有写安娜留在本国受尽严刑拷打,历尽千辛万苦等待与丈夫团圆,而等来的却是一场大悲剧,但他并没有把制造这个悲剧的责任一味放在缺乏责任心的丈夫身上,而是通过钱瘦铁夫妇在安排郭沫若秘密回国时的不同心情,淡淡地揭示出民族文化的积淀。古老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雄性话语为主体的文化史,所谓“兄弟是手足,妻子是衣服”的格言一向为男人们津津乐道,但是言说者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一个前提:第一个说这话的人所指陈的“兄弟”并不是血缘上的亲兄弟,不是的,被称为“手足”的不过是其政治斗争所依靠的主要力量而已。郭安娜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中日两国的战争造成了多少家庭的破碎?如从现实的政治斗争角度来理解,非常时期的个人爱情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必然性的原因;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心安理得地让爱情来服从于社会斗争的需要,轻易把它就毁灭了?这就值得人们深思了。关露的爱情悲剧似乎更加说明问题,基民兄还是出于不忍之心,只是含糊地写出了关露受派遣冒

万死战斗在汪伪特务机关的心脏，本来是德配天地的民族英雄，胜利后却不见容于自己的阵营。但是关露在不公正的政治命运下还遭遇了更不公正的爱情命运，本来在沈志远以后，她与另一位中共党员、左翼知识分子建立了爱情关系，抗战时期那位男子远在重庆担任了中共党的重要工作，而关露只身陷入敌伪世界做着九死一生的工作，这是抗战的需要本也无话可说，等抗战胜利后关露提出与那位男子结婚，可是当时关露的名字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被当作汉奸，有关领导考虑到影响不好，便阻止了他们的婚事。显然，这又是一个郭安娜的命运，即在安排关露从事秘密工作起就决定了她的悲剧性命运。这些悲剧今日重新提起，已经很难为青年读者理解，但如果把这些出生入死的献身精神，仅仅读作爱情与间谍的故事（不幸的是，我见过这样来描写关露的通俗作品），那实在是轻薄了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

基民兄这部书稿中的故事我大多都在文章发表之初就读过，其中最令我感动并叹息再三的，是《蒋碧微生死恋》，虽然我也读过蒋碧微的自传性作品，但仍然被基民兄生动的文笔所打动。为此，我于1997年去台北访问时专门去参观道藩图书馆，想从张道藩的资料里寻找这个故事的余韵。但感到遗憾的是，无论在张道藩生前所写的回忆录和死后别人所辑录的《文坛先进张道藩》里，还是在张道藩的传记《文艺斗士》里，均无只字提到蒋碧微，相反却有很多篇幅写了他的太太如何大贤大德，家庭又如何幸福，等等，许多赞语均由张道藩亲口说出，而对苦恋他20余年、同居10年的蒋碧微却仿佛不存在似的。幸好蒋碧微的回忆录发表于道藩生前，尚留下一个在现代政治与艺术世界里苦苦追求人生与爱之真谛的真实影子。张道藩曾于抗战南京守城之际给蒋碧微立下遗嘱：“一、请将我所著的剧本，汇集齐全，出一部专集；二、假如我的各种作品还没有被焚毁，请为我出一本画册，作为我学美术七年的纪念；三、我最近几个月的笔记，你可以加以删改，隐去关系人姓名和字句，在适当的刊物上

发表,作为我和你的爱情纪念。”当时张道藩身上的浪漫主义艺术家的气味未脱,还能写出如此动情的遗嘱。于是蒋碧微出版回忆录《我与道藩》便是实践第一个诺言;张道藩死后一年,蒋碧微在负债累累、急于出售住家以渡经济难关的情况下,出资印出张道藩的彩色画集分赠亲友,实践了第二个诺言;张道藩死后第二年,蒋碧微又在友人的帮助下辛苦搜集张道藩在大陆期间发表的七个剧本,把《张道藩戏剧集》印了出来,实践了第三个诺言。我在道藩图书馆找到这本自费出版的书,后面只印着“印赠者:蒋碧微。非卖品。”

关于基民兄和他的这本书,我想说的大致就是这些,现在这部书稿将要出版,基民兄嘱我写几句作为序,我也不知这样写法算不算序文,希望能对读者读这本书有些帮助。

陈思和

1999年8月7日于黑水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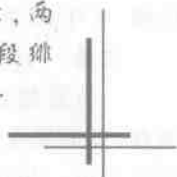
目 录

1	序
1	谜一样的一段情
14	异国之恋
39	他用苦难铸成了欢乐
51	顾圣婴和她的父亲
57	郁达夫在南洋的最后岁月
69	蒋碧微生死恋
174	四一二政变
195	顾顺章叛变的前前后后
223	关露：一个长期被看作汉奸 的女革命家
264	黄定慧：一个经历三次婚恋 的奇女子
280	郭沫若日本归来始末
315	后记

谜一样的一段情

——张大千和李秋君

故事的提起：张大千的回忆录，两位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为一段绯闻所扰，演绎出数不清的故事……



1968年农历除夕，寒风刺骨。已入古稀之年的大千居士偕同自己年轻的妻子徐雯波由温暖如春的巴西八德国寓所坐飞机风尘仆仆地赶到台北。他是应文化学院的邀请来台北，接受中华学术院赠授的“荣誉哲士”的称号，当晚便住在老友张目寒先生的家里。

台湾《征信新闻报》记者谢家孝闻知张大千先生将在台湾逗留一个月，自思机会难得，便请张群先生引见，盼望能为张大千的一生作一个较为完整的记录。盛情难却，大千一改往日不为自己立传的初衷，同意以摆龙门阵的方式向谢家孝回忆自己的一生，并约法三章：“第一不愿录音，第二不要称传记，第三不要涉及他人。”

于是就在大年三十晚上，大千先生和谢家孝围着炉火，一杯

香茗，一碟瓜果，边吃边聊，摆开了龙门阵，开始回忆起自己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以后谢家孝跟着张大千遍游台湾，逐日记录。这一部由“张大千口述，谢家孝笔录”的回忆录，以《张大千的世界》为题，先在《征信新闻报》连载，1968年4月又结集成册，由台湾征信新闻报社出版，全书18万字。这部书的出版，在海内外的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尽管大千先生一再关照“不要涉及他人”，但既然是这么一个经历奇特、褒贬不一、感情色彩极为浓烈的大艺术家的“世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许多人。人们尤为关注的是，书中专列二章“百岁千秋金石情”、“大千心丧报秋君”，谈到了当时留在大陆，同样已进入垂暮之年、已有10多年不闻音讯的女画家李秋君，大千先生将她称之为自己一生中唯有的“知音”……

这是一个缠绵排侧的故事。

一位是驰名中外的大艺术家，风流倜傥，一生中沉醉于醇酒美食、佳丽美女之中，与数不清的女人打过交道，光妻子就先后娶过4位。早年他在朝鲜，拜倒在朝鲜歌妓池春红的石榴裙下，50年以后他故地重游还专门到这位姑娘墓前祭吊洒扫，感慨万端；晚年他又和一位日本姑娘情投意合，藕断丝连，屡次日本之行，大半是为了这一位日本姑娘……然而他将这些女人连同他的4个妻子如同蛛丝一般地轻轻抹去，深情地将李秋君称之为唯有的知音！

大家闺秀，沪上才女，待字闺中，终身未嫁，始终保持着处女之身的李秋君，她不难看，但绝不漂亮，笔者从一张珍藏了足足有半个多世纪的照片上看到，李秋君不过是一位相貌平平、略显富态的中年妇人。而此时她已垂垂老矣，身受多种疾病的困扰，又饱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贫困相加，身边落寂。提起张大千，她不过将他当作自己曾有过的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一在天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影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她怎会想到远在海峡之彼，犹如被重重关山、关山重重所阻

的大千先生会这么炽热地谈论自己！她更不会想到，当她和张大千先生先后离开人世之后，会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根据大千先生所提的那一段绯闻，妙笔生辉沸沸扬扬，“红粉知己”、“彩笔风流”，演绎出数不清的故事……

张大千如是说，有李秋君的兄弟
李祖莱为证；李名胜如是说，有李秋君
的兄弟李祖敏为证——这拉文字公
案，读者自有明鉴。



在《张大千的世界》一书中，大千先生是这样谈到李秋君的：“宁波李家名门望族，世居上海，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作客，李府与我家世交，李府的上一辈二伯父李薇庄，也是老革命，与先烈陈英士先生是好朋友，民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民政厅长（应为“沪军都督府民政厅长”——笔者注），李府的三小姐李秋君，是沪上的才女，家学渊源，诗词书画皆能，若问我谁是我的知音，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复说：李秋君！”

“秋君小姐与我是同庚，记得在我们22岁那一年，李家二伯父薇庄先生，有一天把李祖韩大哥、秋君小姐及我叫到身边私谈，二伯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一听此言，我是既感激，又惶恐，更难过，我连忙跪拜下去，对二伯父叩头说：‘我对不起你们府上，有负雅爱，我在原籍不但结了婚，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委屈秋君小姐！’他们的失望，我当时的难过自不必说了，但秋君从未表示丝毫怨尤，更令

我想不到的，秋君就此一生未嫁！”

“李家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的道理……可是以后秋君待我之好，如同在尽一位贤妻的责任。这在他们家里是公开的，毫无秘密。可是我们之间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事，连一句失礼的笑话都从来没有说过。她对我是关切、爱护，我对她是敬重、感激……”

据谢家孝记载，张大千说这番话时，李秋君的胞弟李祖莱先生在座，他“点着头，不时插言应声”。

以后在无数本有关张大千先生的传记中，谈起这一段，谈起李秋君，无不依据大千先生的这一番话，演绎出数不清的风流故事。

22年过去了，一个偶尔的机会，笔者拜访了李秋君的胞弟李祖桐的儿子李名胜，以后几次促膝长谈，惊讶地发现，大千先生的这一番话，大半都是不正确的！

李家并不是世代望族，李家的发迹是与沙船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所谓沙船是指在海洋上航行的大帆船。李秋君的曾祖李也亭原先不过在沙船业中的巨擘郁家的船上当伙计，李也亭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快地掌握了沙船上航运的诀窍，仅10年功夫，便自立门户，独资开设沙船号，招牌名为久大，又在黄浦江畔盘下了个码头，便是有名的久大码头，到了李薇庄时，已是第三代。

李薇庄一脉兴旺，生了7子4女，老大祖韩，老二祖夔，第3个是个女孩便是李秋君，又名祖云。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李薇庄不是李秋君的二伯父，而是她的父亲。既然大千先生和李家是世交，怎么会连李秋君的父亲是谁都不晓得，而将秋君之父和所谓的二伯父混淆在一起的道理呢？

李薇庄是个急公好义、性格豪爽的人，辛亥革命以后，担任过闸北地区的民政厅长，大千先生把他说成是“上海市民政厅长”，显然是记忆有误。李薇庄30多岁的时候，一次乘马车外

出,不慎途中翻车,被压伤了左肺,以后一直未能痊愈,终于在民国二年(1913年)病逝,年仅41岁。当时李家曾在上海为李薇庄举办了盛大的丧事,各报都有记载,孙中山先生还亲笔题了“子孙永保”4个字,以示哀荣。李薇庄去世时,大千先生和李秋君均为15岁。据专门研究张大千先生的专家李永翘所著的《张大千年谱》中所录,大千先生第一次到上海是1917年,19岁,他和表姐谢舜华在家乡四川内江定了亲,怀着闯荡世界的豪情,由重庆坐着木帆船顺流而下,抵达上海,不久即漂洋过海东渡日本,进了京都公平学校。他和李秋君的初次晤面是在李秋君的大伯李云书家里,时间是1920年秋,两人均为22岁,而此刻李薇庄与世长辞已经整整7年了……

当李名胜和我谈起这番往事时,不时地翻出种种资料,李名胜的小叔、李秋君的胞弟、李氏家族祖字辈唯一存世的老人李祖敏先生恰好去杭州小憩,他也同意李名胜的这些话。“旧事茫茫,予怀渺渺”。“或是或非尘里事,无穷无达醉中身”。大千先生在台北怀着无限深情说下的一席话,竟给文坛留下了一桩公案,这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李秋君这个人——多才多艺，红
颜薄命，一场大病毁了她终身的幸福
……



1899年秋天,李秋君降生在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李家巨宅。以前降生的2位均是公子,李薇庄对这位千金小姐非常

钟爱，视若掌上明珠。

当秋君降临时，由于铁甲轮船的兴起和铁路的修筑，沙船业已经开始凋蔽，但李家早有打算，已经把祖宗创下的产业向地产和实业发展。

李秋君人长得虽不漂亮，但聪明伶俐，活泼好动，生在这样的殷实之家，真可谓享福已尽。谁晓得乐极生悲，她从小就染上了肺病。当时得了这种毛病，犹如今天人们患了癌症一样可怕，几乎没有办法医治，唯有办法一是营养，二是静养。

好在李家有的是钱，经过名医诊治，凡是医生开出的营养品，人参燕窝鱼翅，李薇庄一一替女儿办到了；而要让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孩子静下心来却颇费周折，最后还是大哥李祖韩出了个主意，让她同自己一块儿学习书画。

当时上海画家如云，是“海上画派”的鼎盛时期，李祖韩同陈小蝶、江小鹑等是“中国画会”的中坚分子，同时李祖韩又同吴昌硕、王一亭、曾农髯等结成了一个“秋英社”，旨在提携后进，培养“新生力量”。经王一亭先生推荐，李秋君正式拜吴杏芬先生为师。

李秋君很有绘画的天赋，经过10多年的努力，颇得吴杏芬老人的真传。陈小蝶在《春申旧闻》“瓯湘余韵”中说：“祖韩虽好书画，但以地产事业为中心，故不专近。而秋君则为吴杏芬老人高足，得宛米山房汪仲山为之润色，山水卓然成家，颇近吴秋农、陆廉夫；画仕女则兼采张大千意法，以写生法作古装美女，神采生动，几夺大千之席，故大千亦为之嚮折不已。”但李秋君平时最得意的即是画竹，她将自己的画阁取名“瓯湘馆”，“翠竹梢云自结丛，轻花嫩笋欲凌空”，寓意为“画竹之室”。

李秋君成名极早，她曾到日本、比利时开过画展，她的“松山读易图”还曾在比利时得过金奖。一个女画家，在二三十年代就享有这么大名气，这在中国是罕见的。有人讲李秋君的画名得自于张大千，这显然是不对的。

其实大千先生在爱情上也是非常不幸的，他的放浪形骸某种意义上却是在掩饰他内心的苦痛。1920年初，大千远在日本，惊闻与他青梅竹马、情感至深的未婚妻谢舜华病逝内江，大千极度悲痛，即返上海，欲回内江奔丧，但终因战乱绵绵道路不靖，未能成行，于是又回到了日本。谁晓得母亲又替他续订了倪家之女，要他择日完婚。第二年大千回到家乡，才晓得这位倪家姑娘竟是个痴呆症患者，大千坚决不从，一怒之下到上海出家，做了100天和尚，最后又被他的哥哥张善孖找到，押回内江，与他并不喜爱的女子曾正容结了婚……

1922年5月，张大千又一次来到上海，由曾农髯引见，拜当时最杰出的书法大家李瑞清为师，跟他学习书法，同时又跟李瑞清的弟弟李筠庵学习鉴赏。当时，李氏昆仲都是李秋君的大伯李云书家的座上客。张大千和李家并非世交，他就是通过这层关系结识李秋君的。

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张大千是个美食家，他不仅会吃，而且还做得一手好菜。李瑞清虽然做过大官，光绪年间官至藩台，但晚境凄凉，他也是一个饕餮之徒，以前曾享有“李百蟹”的美誉（即一餐吃下一百只螃蟹），可这个时候只能“一日仅饱三餐粥”了！李瑞清生得一副傲骨，从不要别人接济，一手擘窠大字，写得气势磅礴无与伦比，李祖韩为了得到李瑞清的字，经常借李云书的名义，请李氏昆仲吃饭，有时李瑞清也将张大千一同带去，兴之所致，便让张大千下厨掌勺。

一日，李秋君从大哥处得知，四川来了一个怪人，年纪轻轻却留着一口美髯，书画俱精，还烧得一手好菜，便跟着大哥到南市大伯父家里，认识了张大千。这一天恰好张大千下厨掌勺，烧了一大碗东坡肉，李瑞清“三月不知肉味”，巴掌大的肉也不知吃了几块，还兴致勃勃地替爱徒连挟三块，张大千连连惊呼“吃不消”，但碍着师傅情面强咽了下去。第一次见面，就看到张大千的这副狼狈相，乐得李秋君在一旁掩口大笑……